

晚清笔记

马勇 著



SPM

南方
书局



晚清笔记

马
勇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笔记：百家小集 / 马勇著.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10

ISBN 978-7-218-11894-9

I. ①晚… II. ①马…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清后期 IV. ①K252.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8896号

Wanqing Biji

晚清笔记

马勇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肖风华

责任编辑：胡扬文

装帧设计：张绮华

责任技编：周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 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本：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50千

版次：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5240

序

承蒙向继东先生雅意，使我有机会将过去很多年有关晚清史事的一些散篇汇集起来单独出版。编定之余，还有一点感想，说出来与读者诸君分享。

前贤很早就指出，晚清以来的中国，是“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但对这个“巨变”的内涵、前景，则见仁见智。在过去三十年，我在阅读晚清史料时，脑子里时常想起这些言说，也总想弄清这个历史巨变的真意义。

在我看来，中国历史至今只有三次涉及根本性质的大变化。第一次发生在商周时期，中国人从氏族社会向国家形态演变，渐渐形成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的“封建体制”，人们从家族、氏族小的“共同体”向更大的区域共同体过渡。这是因

为人类生命的脆弱，小的共同体无法应对自然困难、人为困难，人们需要团结，需要结合。

在封建体制存在的那些年，各个国家之间为了利益相互争夺。在争夺的过程中，也就出现了由小的共同体向更大的共同体合并的趋势。我们读《墨子》，知道在墨子、孔子的时代，孔子称曾看过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历史书，墨子也说“吾见百国《春秋》”，足见那时的中国依然还是邦国林立的状态，周天子只是各个诸侯国推出来的“共主”。但是在孔墨之后几百年，到了战国中晚期，在“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惨烈竞争中，剩下来的不过就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那几家。即便这几家，也如贾谊《过秦论》所说，“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海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至此，中国渐渐告别了封建，走向了帝制时代，王朝政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巨变。

帝制时代、王朝政治，加上农业文明，秦帝国之后的两千年，中国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四民社会结构、重农抑商政策，科举制度，对外的贸易自由原则，不仅让中国建构了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且确实几度实现了盛世。文明的积淀举世罕见。我们不应该以后来的落后，低估中国文明的古典

成就。

但是，到了明代中晚期，西方社会渐渐从中世纪中走出，文艺复兴、思想启蒙，新的生产方法、生活方式渐渐改变了世界，也必将改变中国。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许多人认为鸦片战争之前中国闭关锁国，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这其实是不对的。明代之前的中国，对世界从来不陌生。汉唐、宋元，甚至数度主导全球贸易。直至明清，尽管政府多次实行禁海政策，但持续数百年、耗费无数财富、人力剿不尽、打不败的“倭寇”，表明中国与外部世界从没有中断过联系，只是中国不愿意就此改变而已。

从明代中期至清乾隆末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一直处于顺差，国内消费不充分，西方世界对中国物品的依赖，让中国一直享受着国际收支顺差。读弗兰克《白银资本》，我们可以很清楚感受到这一点，可以体会出康乾盛世绝非御用史学家的溢美之词，而是真金白银堆砌出来的。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理解西方，理解近代，理解工业文明，理解国际资本，理解国际市场，理解全球化，那么中国凭借康乾盛世绝对的外汇储备优势，应该很容易实现产业引进，很容易像日本那样完成自己的工业革命。

然而，中国在乾隆之后又差不多耽搁了一百年时间。直至甲午战败，中国人方才明白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意

义，方才有机会搭上全球一体化的便车。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晚清，我觉得这是一个类似于先前历史大转折，甚至比那两次大转折更宏大、更艰难的历史巨变。这是一个历史大时代，不是“小时代”。这需要几代人的坚持，需要数百年的过渡。

我的晚清史，大致立足于此。希望从宏大的历史转折中，看清中国的方向。至于本书中的几个短篇，不过是大时代中的几朵浪花。

历史是一个常说常新的科目。我们没有办法起前人于九泉之下，没有办法对质，我们的言说，只是我们的观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们知道有一座历史大山，但我们能够描述的只是大山的一个小小的角落。一个逼近历史真相的晚清史，还需要几代学者不懈努力。

马 勇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
目次
—

- 001 关键十年：从甲申到甲午
- 024 慈禧光绪关系论：以甲午战前为主
- 061 胶州湾事件：戊戌变革缘起
- 089 翁同龢开缺背景、过程与原因
- 141 康有为“衣带诏”来龙去脉
- 174 王爷纷争与义和团战争起源
- 198 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诸问题

关键十年：从甲申到甲午

咸丰末年，因通商条约的修改，英法曾于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年两次向中国派遣远征军，其结果就是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和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的签订。这些条约一方面使中国丧失了一些权利，另一方面中国因这些条约不得不向外部大幅度开放，被迫走上学习西方的路。短短十几年，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发生，“后发优势”让中国获得了迅猛发展：从零起步，中国构建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国力也有极大提升。工业基础的建立，经济实力的提升，都为中国更进一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不仅没有进一步改革，反而陷入一系列无端困扰，以致于错失十年

发展改革机遇期，直至甲午战争结束才重回改革正轨。

战略调整

光绪十年，公元一八八四年，中国旧纪年为甲申年。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召见御前大臣、六部尚书等，旋明发谕旨宣懿旨，改组政府，将恭亲王奕訢等逐出军机处：

“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尤巨，政虞丛脞，民未救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萎靡，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实亦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显。若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烈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诸臻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惻然。”^①

具体处分是：

恭亲王奕訢、大学士宝鋆入值最久，责备宜严。

① 《清德宗实录》卷一七九。

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沂著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双俸，开去一切差使，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

宝璫著原品休致。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著开去一切差使，降两级调用。

工部尚书翁同龢甫值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著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

懿旨指出：“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办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貽误愈深则获咎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嗣后内外臣工务当痛戒因循，各摅忠悃，建言者秉公献替，务期远大，朝廷但察其心，不责其迹。苟于国事有补，无不虚衷嘉纳。倘有门户之弊，标榜之风，假公济私，倾轧攻讦，甚至品行卑鄙，为人驱使，就中受贿渔利，必当立抉其隐，按法惩治不贷。”^①

① 《清德宗实录》卷一七九。

“旧人”恭亲王奕訢等退出军机处等重要机构，暂且接替他们的为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他们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稍后，又任命刑部左侍郎许庚身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第二天，慈禧太后又发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①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甲申易枢”，被许多研究者视为慈禧太后一生中的第二次“政变”，恭亲王奕訢暂时离开了政治舞台，清廷政治由此开启新一轮调整。

恭亲王奕訢是咸丰帝六弟，也是慈禧太后的“小叔子”，在一八六一年“辛酉政变”中，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齐心协力，扳倒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所谓“顾命八大臣”。此后，恭亲王奕訢的权力虽然起伏不定，但就其大略而论，他是清帝国二把手，只是在同治帝亲政那几年，他的权力略受影响。

奕訢长时期处于权力顶端，是清帝国政务近乎最后的拍板者，因而他不可能时时事事都与嫂子慈禧太后完全一致，叔嫂间有某种心结在所难免。但如果仔细追究恭亲王在“甲申易枢”被免职的原因，更多的不是他们叔嫂间的矛盾，而是之前

① 《清德宗实录》卷一七九。

一系列政治决策的失误。

就史实而言，“甲申易枢”的契机为五天前（三月初八日）盛昱的一份弹劾奏折。盛昱出身宗室，此时为詹事府左庶子，正五品，他的这份奏折引发清代中晚期一场重大政治变故。但这份奏折在盛昱所编文集中并没有保留，在《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等官方文书中也不见踪影，后因吴相湘留心搜寻，得以在故宫档案中发现，因而现在有可能据此分析“甲申易枢”真相。

盛奏题为：“奏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事。”奏折开篇直言：“窃越事失机，议者皆谓咎在云南抚臣唐炯、广西抚臣徐延旭，现已奉旨拿问。奴才谓唐炯、徐延旭坐误事机，其罪固无可逭，而枢臣之蒙蔽诿卸，罪实浮于唐炯、徐延旭。奴才敢不避嫌怨，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所谓“越事”，即因越南前途而正在进行的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是恭亲王奕訢的“滑铁卢”，他在前半生积累的英名因“越事”而差不多丧失殆尽。诚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盛昱之参劾军机处诸人，原是由于自恭王以次的诸军机大臣，在中法两国因越南问题而起的交涉中，自始即未能把握时机，早决和战大计。而军机大臣所安排在广西、云南二省担任领兵作战的巡抚大员，则又都是虚骄无用的唐炯、徐延旭之辈，以致军不能战，一旦面临法人来攻，即刻溃败。相继

其下续论唐、徐二人乃张佩纶与李鸿藻所保荐，是为轻信滥保，失人僨事。更以恭王以下的其他各军机大臣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罪实应与李鸿藻同科。但是在失律僨事之后，太后及皇上虽有旨将唐、徐等人革职拿问，而军机处并不拟颁明发谕旨，欲使天下之人不知有此失律逮问之事，其粉饰蒙蔽之罪，实不可恕。”^① 盛昱的奏折，成为“甲申易枢”最直接的原因。

“甲申易枢”是晚清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过往的研究多从慈禧太后、恭亲王叔嫂关系着眼，固然为一方向。他们二人在二十多年时间里不可能时时处处全然一致，矛盾、心结，绝对为事实。但“甲申易枢”关键点不在他们二人的矛盾，而是清帝国内外政策大调整，以恭亲王为首的执政团队必须对先前错误决策负责。

先前政策失误主要体现在“越事”上。越南是清帝国“属邦”，但在西方资本大规模东向背景下，清帝国究竟应该怎样处理藩国事务，恭亲王执政团队确实做得不太好，这主要体现在：错误估计了中国先前二十年发展实力，以为藩国就是自己的地盘，容不得他人染指；不清楚法国的战略意图，更不明白国际资本东向的意义。此后清帝国的政策调整，大致围绕这个线索。

^① 庄练：《咸丰、慈禧与恭王》，《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5页。

宗藩解体

“甲申易枢”后，中法战争迅速结束，中国“不败而败”，失去了越南，进而失去南部边陲诸藩国。更进一步，就是宗藩解体。

宗藩体制，又称为朝贡体制，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独特现象。这个体制既类似于直至现在还存在的英联邦情形，但又不完全像。作为宗主国，中原王朝不会干预藩国内部事务，“番邦自主”，番邦自主处理自己的内政与外交。宗主国与藩国有一种特殊的贸易交流，这就是“朝贡体制”。朝贡体制是一种不平等的，不以实际贸易价值为价值的贸易体制，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利益。宗主国不是要从藩国获得平等的贸易补偿，更不是平等的贸易往来。宗主国与藩国政治的联盟大于经济利益的互补。藩国对宗主国寻求政治保护，一旦藩国遇到了什么外部危机，或内部纷争不可化解，方才请宗主国介入，宗主国这时就要履行自己的道义责任，率有道伐无道，拯救藩国。^①

^① 蒋廷黻指出，“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4页。

如果从文明进程角度而言，藩国就是中国文明术语中的“生番”。他们在中国文明长期熏染下慢慢形成内聚倾向，渐渐积累内向动能，一旦发生某种不易克服的危机，他们自然而然会倒向中原，加入中国文明一体化进程，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中国的“政治边疆”能够从黄河中下游一隅弹丸之地演变成“四至”，周边族群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以及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族群相继消失，他们并不是简单地被中原武力征服，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了中原文明，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以夏化夷”。

在西方因素进入东方前，中国的文化边疆、政治边疆一直以这样的方式在扩张。但当西方因素进来后，特别是当清帝国经受西方几次打击不得不转身向西时，中国的文化边疆、政治边疆不再向外扩张，反而极大收缩。中国要发展，要转型，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维持在东亚的盟主地位，更没有精力、实力去照料周边这些藩国。在十九世纪中期，清帝国渐渐放弃了“王道主义”。这是中法战争的文化背景。

另一方面，西方势力东来，尤其是清帝国与西方诸国几次战争经历，让中国人意识到原来的宗藩体制已失去意义。宗藩体制的制度设计，除了文明边疆的扩张，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让藩国承担“战略缓冲”功能。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奏称：

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①

照周德润理解，历史上的属国，就是中国的“国防外线”，是“代我守门户”。在西方势力东来前，这种看法具有相当道理。但到了近代，局势就大不同了。英国在道光年间直攻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英法联军在咸丰年间长驱直入，打进了北京。原先觉得相当重要的所谓“国防外线”并没有发挥预想作用。因而等到清帝国与英法讲和，开始学习西方后，渐渐放弃了“国防外线”的传统思维，不再刻意经营周边番邦。

清帝国不再刻意经营周边，但对于这些长时期追随中原王朝的藩国，究竟应该如何安置，清廷统治者并没有成熟方案，更没有我们后来看到的英帝国从殖民地撤退的经验。

“我们应该协助这些弱小国家独立，因为独立的高丽、琉球、越南、缅甸绝不能侵略我们。所怕的不是他们独立，是怕

^① 《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请保藩封以安中夏折》，《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第2页。